

《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书评

——译者序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是美国政治学者艾伦·D·赫茨克(Allen D. Hertzke)教授的成名之作。赫茨克教授曾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博士学位(1986年),现为俄克拉荷马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除《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一书外,赫茨克教授的重要著作还有《不平之声:杰西·杰克逊、帕特·罗伯逊与人民党主义的复兴》(Echoes of Discontent: Jessie Jackson, Pat Robertson, and the Resurgence of Populism)(1993年)及《美国的宗教与政治:信仰、文化与战略选择》(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aith, Culture, & Strategic Choices)(合著,1995初版、1999年再版)等。

《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原系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1988年由田纳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好评如潮,被公认为当时关于美国宗教游说团体的“最全面深入的研究”。其实在赫茨克之前,关于美国宗教游说团体的学术研究可说是凤毛麟角,主要的研究著作只有卢克·埃伯索尔(Luke Abersole)的《在国家首都的教会游说》(Church Lobbying in the Nation's Capital)(1970年)和詹姆斯·L·亚当斯(James L. Adams)的《在华盛顿日益增长的教会游说》(The Growing Church Lobby in Washington)(1970年)两部,而与《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同年问世的马修·C·莫恩(Matthew C. Moen)的《宗教右翼与国会》(The Religious Right and Congress)一书虽考察了80年代基督教保守派在美国国会的活动,但范围较窄。其他那些关于美国宗教与政治之关系的论著如A·詹姆斯·赖克利(A. James Reichley)的《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宗教》(Religion in American Public Life)(1985年)和肯尼斯·D·沃尔德(Kenneth D. Wald)的《美国的宗教与政治》(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1987年)等只是极简略地提到宗教利益团体的活动。故《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又被称为关于宗教游说的“20年一遇的好书”,且大大超越了前人的研究。

学者对宗教游说之所以少有问津者,是因为当时美国政治学界对宗教问题并不重视,比如几乎所有关于利益团体的研究均忽视了教会的政治作用,故赫茨克在书中呼吁加强对美国宗教与政治之关系的研究,指出“不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国政治”。(第107页)然而宗教游说之相对不发达,也不失为原因之一。从历史上看,虽然宗教在美国政治中一直起重要作用,但在华盛顿永久性教会游说团体的出现则相对较晚。1916年卫理公会为开展禁酒运动在华盛顿设立第一个教会游说机构,1919年天主教会也在华盛顿设立“全国天主教福利理事会”(现“美国天主教会议”的前身)来处理 and 应对公共政策问题。目前美国首都的绝大多数教会游说团体都是在20世纪40和5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而宗教团体进行大规模的、激烈的游说活动,则开始于60年代,首先是教会支持制定1964年民权法、接着是自由派教会反对越战、天主教主教团关于核战争和国内经济的牧函、再就是宗教新右翼的崛起及其有争议的政治活动如反堕胎等。赫茨克的研究表明,在1950年华盛顿只有16个主要宗教游说团体,而到80年代中期这些团体至少有80多个,是30多年前的5倍。据美国学者保罗·J·韦伯(Paul J. Weber)和W·兰迪斯·琼斯(W. Landis Jones)所编的工具书《美国宗教利益团体》(U. S. Religious Interest Groups)(1994年)的统计,90年代初美国的宗教利益或游说团体已增至120个。此外,随着美国政党的相对衰落及国会议员在竞选活动和国会工作中自主性的提高,各种游说团体的重要性也日益增长。宗教游说团体的发达自然引起

媒体的大量关注，而赫茨克的《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一书的问世，可说是政治学界对宗教“游说活动爆炸”而作的学术反应。

作为关于美国宗教利益团体研究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在讨论宗教利益团体时使用了“代表”或“代表权”概念，来解释宗教游说者与他们世俗同行之间的差异。与所有游说团体一样，宗教游说团体也必须代表机构的利益和国内的支持者；但与世俗游说团体不同，宗教游说团体利他主义的性质使它们更经常地代表“非精英”的社会阶层，“表达了广泛持有但却未得到充分代表的意见和价值观”，（第 130 页）因此它们在华盛顿的压力体制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游说界的不正之风”，（序言）并且扩大了美国政体的代表性和多元性。与一般对游说利益团体的批评不同，显然《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对宗教游说的评价是相当肯定的。作者将关于宗教游说的讨论置于传统政治学关于利益或游说团体的所谓主流研究之中，使该书无论对美国宗教及政治研究者还是对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者均有较大参考价值。

《在华盛顿代表上帝》进一步指出，与其他游说团体通常只代表国内支持者不同，宗教游说团体还代表着神学传统和国际上的同宗派教徒，因此更具国际性，有时教会的国际关系网还是美国宗教游说团体的游说资源，成为它们获得信息和影响的重要渠道，比如作者在书中就注意到，“最近对众议员外交政策支持者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战略性国家的内情方面，宗教团体被委员会成员看作（独立于行政当局的）关键信息来源。”（第 81 页）世界上各大主要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均是全球性的或跨地区、跨民族的，此种“无国界性”极易使宗教与一国的外交政策或国际关系发生密切的联系，使宗教成为“无国界政治”现象。作者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称“在 21 世纪里美国宗教游说将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这是美国宗教游说十分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

其次，《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一书通过大量对国会议员助手及宗教游说团体的个别访谈、民意测验和文献资料，浓笔重抹地勾勒了主流新教、和平主义新教、福音派、基要派、天主教、犹太教等教会游说团体的游说策略和幕后活动，该书的第六章是关于要求给予公立学校学生宗教团体与其他学生团体同样权利在课余时间使用学校设施的“平等使用权”通过前后立法斗争和策略的个案研究，堪称研究宗教游说团体游说策略、成效和这些团体之间互动的经典研究，为我们了解宗教游说团体在美国国会的具体运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此前关于游说团体的研究往往只注重这些团体的“投入”（即组织、策略和目标等）而忽视“产出”（即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作者根据传统的“局外人”和“局内人”游说策略的分类，把宗教团体的国会游说战略分为从国会议员家乡选区施加压力的策略，其中包括大规模群众动员、精英动员、直接选民动员及操纵媒体事件等，和古典局内人策略两类。一般来说，主流派或自由派教会擅长直接的局内人策略，而福音保守派教会则依赖间接的基层或草根动员。不过作者发现，在此前的 10 年中，无论是主流派还是福音派教会均在调整策略以扩大影响，主流派教会正日益采用直接通信等基层动员手段，而福音派教会也越来越成为“局内人”，在国会各种程序、规则和委员会中游刃有余，游说策略或手段已不足以区分神学或意识形态不同的教会团体。不过，在赫茨克撰写此书的年代，自由派和保守派教会似确有“分工”或“专长”：自由派教会强调外交和国内经济问题，而保守派教会则更关注社会和道德文化问题。作者质疑当时所谓宗教游说团体尤其是自由派团体脱离教会群众、是“没有军队的将军”的流行观点，指出宗教游说者的游说政策并非且不可能总是与教堂座位上的普通信众大相径庭。事实上，一般来说宗教游说团体的成效是与它们代表其成员的程度成正比的，只有在那些不仅有本教会信徒赞同、而且赢得广大社会支持的议题上它们才最为有效。作者承认宗教团体的游说政策、尤其是自由派团体的游说政策，有时确实与本教会会众观点之间有较大差距，指出此种代表制上的缺陷可能导致这些团体政治上边缘化甚至出局的结果。宗教保守派游说团体比自由派游说团体在适应国会实用、竞争、多元和妥协的政治现实方面更快且更具灵活性，作者的这一发

现既出乎意料又颇具讽刺意味。

再次,《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一书的另一重要发现,就是教会游说团体与它们在其中进行游说活动的国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宗教游说团体如要在各种自由派议题(如反对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国际救济)和保守派议题(如反对堕胎、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学校祈祷)上影响国会决策,它们就必须调整游说策略以适应国会多元化的压力体制和讨价还价的游说规则,而国会组织和环境“也在宗教团体中助长了某种战术性实用主义”,(第 70 页)并且使宗教先知主义和许多宗教组织的激进或边缘政治温和化。作者指出,除人数少、预算低和缺乏经验等先天不足外,宗教游说团体的最大弱点就是坚持先知式的道德立场,在政治过程中以非白即黑的两分法来看待问题,而国会拒绝好斗的极端立场的,因此宗教游说团体在“见证真理”和取得政治影响力之间必须有所取舍。事实上为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无论自由派如“全国基督教协会”还是保守派如“道德多数派”都必须与政治磨合,扩大支持面而放弃某些极端的立场,甚至与对手结盟。因此“成功等于妥协”,较少宗教性往往意味着较大的实效,美国政治中被广泛接受的世俗表述要被用来取代狭窄的教会语言或先知式的宏论,而“策略上的通情达理可转化为对体制的通融”。(第 133 页)不过作者告诫宗教游说团体的是,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为人们提供安全感和社区感是其立身之本,如宗教团体过多或过于公开地介入政治,引入政治斗争中的功利和胜负动因,那就将损害宗教的功能及教会在美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导致宗教政治化或那种认为在公共事务中只有一个道德或宗教上可接受立场的观点。因此,如何在道德权威和政治参与之间保持适度平衡,一直是宗教游说团体所面临的难题。

当然与所有学术著作一样,《在华盛顿代表上帝》远非无懈可击。有论者认为作为该研究主要依据的对宗教团体的访谈范围较窄,所采访的 34 个团体中的大部分是白人新教团体,作为美国最大教会的天主教会和游说最有效的犹太人团体在作者的名单中只各占 3 席。作者列入福音派的 9 个团体中至少有 6 个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派,因此这一研究宗教团体代表性著作本身的代表性也受到质疑;因该书组织结构之需要,作者在不同的标题下反复讨论一些宗教游说团体,也有重复拖沓之嫌;对教会游说这样宗教行动主义的宪法框架的讨论尚付阙如;宗教游说团体、广大选民和国会议员这一三角关系也许比作者所描述的更为动态和复杂;而“平等使用权法”无论在美国政治还是美国政教关系的发展中,均非重要立法。对该法案的研究,不管多么详尽,似乎并不能真正说明宗教游说对美国公共政策究竟有多大影响。事实上如果只有采取非宗教语言和世俗政治战略才能取胜,也许反而说明宗教游说对政治的影响有限。尽管有种种批评,《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仍称得上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关于美国宗教游说的权威性学术专著。

笔者在《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出版后不久便见到此书,以后还将它列为所授美国宗教课程的主要参考书之一。作为全国高校文科重点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设有美国宗教与社会研究项目。作为跨宗教和政治学科的重要研究成果,《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一书的翻译工作于是便被纳入该研究项目的出版计划,以期增进对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宗教游说团体在美国国会的具体运作过程更深入的了解。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许多支持。该书的出版者美国田纳西大学出版社的政治学部主任珍妮弗·M·赛勒(Jennifer M. Siler)女士慷慨赠与我们该书中文版版权;赫茨克教授不仅自始至终关心我们的翻译,并且还专门为我们撰写了中文版序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宗教与美国外交政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宗教与美国社会”和美国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均为本书的翻译出版提供了部分经费。在此我代表译者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我的两位研究生黄凯和吴志浩分别翻译了第 1 至 4 章和第 5 至 7 章的大部分初稿,我则做了补译和改译工作,并通校了全书。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有限,翻译中的错漏在所难免,祈望行家指正。

Allen D. Hertzke, *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 The Role of Religious Lobbies in the American Polity*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8)

艾伦·D·赫茨克：《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田纳西大学出版社1988年。徐以骅、黄凯、吴志浩译、徐以骅校，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A Brevue of Book‘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 The Role of Religious Lobbies in the American Polity’

Xu Ye-hua

收稿日期：2003-6-12

作者简介：徐以骅，男(汉族)，上海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